

往事历历

40年回眸

◎ 庄智象 主编

2 知名外语学者
与改革开放

往事历历

40年回眸

◎ 庄智象 主编

知名外语学者
与改革开放

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往事历历 40年回眸:知名外语学者与改革开放 / 庄智象主编.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8

ISBN 978-7-5446-5578-1

I. ①往… II. ①庄… III. ①外语教学—教学研究—中国 IV. ①H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26268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苗 杨 梁晓莉 奚玲燕

印 刷: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张 84 字数 1325千字

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5578-1 / G

定 价: 268.00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质量服务热线: 4008-213-263 电子邮箱: editorial@sflep.com

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卫茂平	王文斌	王守仁	方梦之	叶兴国
仲伟合	庄智象	刘建达	刘曙雄	许 钧
杨惠中	李克勇	李绍山	束定芳	何兆熊
何其莘	张绍杰	陆建德	陆经生	陈众议
陈建平	罗选民	周 烈	胡文仲	姜 锋
洪 岗	徐真华	殷企平	黄友义	黄国文
黄源深	黄震华	曹德明	龚亚夫	蒋洪新
程晓堂	蔡伟良	谭晶华	潘文国	戴炜栋

编者的话

1978年12月18—22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迈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新征程。40年来,中国人民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外交、军事和社会发展等各项事业和领域取得了令人骄傲的进步,成绩辉煌,令世界瞩目。40年的历程,40年的学习,40年的思考,40年的探索,40年的实践,40年的艰苦奋斗,40年的发展,40年的成就,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许许多多的感悟、数不尽的经验、成千上万可歌可泣的故事、无数人默默无闻的奉献,共同谱写了改革开放伟大征程的华丽乐章,绘制了绚烂多彩的宏伟画卷。在改革开放40年到来之际,回顾和总结40年的变迁与发展,有其特殊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40年来,我国的外语教育事业迅猛发展,无论是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学科建设、文化传承传播、社会服务,还是国际交流与合作,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和进步,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今天我们回顾总结外语教育改革开放40年,就是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前进,改革开放再出发。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之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分别组织编写出版了“改革开放30年中国外语教育发展丛书”和“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外语教育发展研究丛书”,就外语教育的发展进行了一定层面上的回顾、总结和展望,赢得了外语界人士的一致好评,被有关媒体列为年度最有影响力的出版物之一。在迎来改革开放40年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节点,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组织、策划、编辑出版《往事历历 40年回眸:知名外语学者与改革开放》

(三卷本),盛邀外语界和相关领域的百余位知名专家、教授、学者纪实讲述改革开放40年中,最难忘、最具代表性的亲身实例,以小见大,由点及面,反映改革开放为个人的学术生涯或其他方面带来的历史性的变化与发展,作为我国外语界共庆改革开放的献礼之作。我们希望通过回顾、梳理、总结与展望,共同纪念和见证改革开放40年带来的嬗变与发展。

这逾百位知名专家、教授、学者,有的参与了我国外语教育教学的顶层设计;有的参与了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的是外语教育教学改革的践行者;有的是某一新学科或学术领域的创建者和倡导者;有的是外语教育教学管理改革的探索者和先行者,等等。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角度以微见著,反映了40年中,他们的所行、所见、所闻、所思和所悟。他们有的出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的出生于五六十年代。尽管经历不同,参与和见证改革开放的时间有长有短,但他们都是改革开放的经历者、见证者、贡献者和受益者。他们的记述,让我们更加坚信:没有改革开放便没有强大的中国,也没有我国外语教育的兴起和发展。

这逾百位作者都是名家、专家,如何编排他们文章的顺序,颇费踌躇。经再三斟酌,我们决定排序不按爵,按名家、专家的年龄顺序排列,以示尊老敬老。希望这样的编排顺序能得到大家的赞同。

我国外语界的名家、专家人数众多,远不止为此书撰稿的作者。由于组稿时间仓促,再加上我们工作的疏漏,或信息的不全,或由于被约稿者工作繁忙、健康等各种原因,未能恭请到更多名家、专家为此书撰文,我们深感遗憾并深表歉意。

本书的策划和组稿过程中,得到了编委会各位专家、教授的全力支持和鼎力相助;得到了各位作者的倾情奉献;得到了出版社的关心和支持;得到了出版社学术事业部孙静主任和责任编辑苗杨、梁晓莉和奚玲燕的倾心付出。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深深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教授在百忙中为本书作序,让我们深感荣幸,并深为感动。在此,向吴部长表示由衷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庄智象

2018年11月

序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长足发展,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作为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高校外语教学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教育改革始终在路上,这是由当前我国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如何处理好公平、质量、规模的关系,让人民更好地受惠于教育改革的成果,是当前摆在教育界面前的重要课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总结教育改革的得失,总结外语教学改革的成败,时机还不成熟,也许过十年再回头看,会更全面和客观些。但是记录专家学者的故事和感悟,无疑将留下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于是,庄智象教授策划《往事历历 40 年回眸:知名外语学者与改革开放》并邀我写序,我欣然应允。

我的专业是电子工程,与外语关系不大,直到 2003 年到教育部任职后,分管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参与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和四六级考试改革,方有了较深入的了解。拿到书稿,翻开目录,一个个熟悉、亲切的名字勾起了我的回忆。

向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致敬

我 1986 年起在同济大学工作了 18 年。虽然学校性质不同,但因为同在上海的关系,而且上外离同济很近,我与戴炜栋校长的交往自然多几分,向他请教的机会也多些。20 世纪最后的十年,教育改革力度大,头绪多:211 工程、高校扩招、大学合校,每一项工作都不容疏忽,稍有差池,对社会、对学校、对学生影响甚大。对于这些问题,我和戴校长有着相似的看法,而上外创新的思路和做法,给了我不少启发。做大学校长是件苦差,我干了八年。现在如果有人叫我再去做校长,我是

肯定不干的。但是戴校长从1990年干到2005年,同时还长期担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那需要何等的勇气、智慧和毅力。

本书的作者中还有许多专家或担任外语类高校领导,或在外语专业和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任职,或在四六级、四八级考试委员会任职,或在有关学术机构任职,想必他们也有同感。但是外语教学改革真离不开他们。他们用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用辛酸和汗水,谱写了改革开放以来外语教学发展的壮丽篇章。

向无私奉献的师者风范致敬

在教育部的会议上,我曾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真正做到教育以育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办学以人才为本,以教师为主体,实现统筹高等教育的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协调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重点要放在提高质量上,需要一大批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名师。

本书的作者逾百人,尽管所学、所攻的语种和学术领域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光荣称谓:老师。本书作者大多有着30年的教学历经,从教40年也不在少数。他们有的年逾古稀,虽已不从事一线教学,但仍通过著书、讲学传道解惑;不少已抵耳顺之岁,依然坚守三尺讲台,为培养外语人才孜孜以求;多数已过知非之年,除了带研究生,还坚持为本科生授课,是高校外语教学的主力军。正是这样一批可敬、可爱的师者,为我们的教育改革和外语教学改革打下了坚实的质量基础。他们中不少人的从教故事,我听说过一些,很受感动,现在再读,更多了一份敬意。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他们将毕生所学传授给学生,同时也用自己对教育事业的执着为后辈诠释着无私奉献的师者风范和厚德载物的中华民族气节。

向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致敬

我是搞工科的,对工程师的工作更了解一些。古往今来,人类创造了无数个工程奇迹。这些杰出的工程背后,是工程师不断学习理解新技术,解决生产新需求的不懈探索,是不断战胜困难、挑战自我的不懈努力,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其实,做学问也是这个道理。

本书中求学、治学的故事占了一大半的篇幅,讲述了作者历经艰难,甚至是道

路曲折的学术生涯。本书的作者中,不少人的学习、研究之路是随改革开放而始的。那时候的条件不可谓不艰苦,学习资料有限,科研信息和学术交流闭塞,国外留学机会不多,可就是凭着对知识的渴望、对学术的执着、对未来的憧憬,我们的学者开创了我国高校外语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从语言学、文学、比较文学,到中外语言比较、译介学、文化、跨文化、二语习得、教学理论方法,从俄语、英语到法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和非通用语,理论框架建立起来了,实践经验积累起来了,教学手段完善起来了,研究成果丰富起来了。治学之路漫漫,求索精神永驻。

读完故事,合上书稿,突然觉得这套书的意义不仅仅是留下那些令人难忘的经历和感人至深的瞬间,而是通过专家学者的视野记录外语教育发展、外语教学改革历程,因为他们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是外语教育的引领者,是外语教学改革的实践者。鉴于此,本书的出版对未来十年我国外语教学改革的深化和教育质量的进一步提升是大有裨益的。感谢本书的策划人庄智象教授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全心致力于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作出的努力!

吴智迪

2018年11月

目 录

- 谭载喜 中国翻译研究 40 年：亲历者眼中的译学开放、传承与发展 / 1
- 黄友义 40 年见证两轮翻译高潮 / 13
- 陆经生 助力中国西班牙语教学的快速发展 / 25
- 李维屏 异国学术路上的历练与感悟 / 41
- 蔡伟良 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忆事 / 51
- 叶兴国 我的命运转折和学术转向 / 63
- 龚亚夫 亲历基础英语教育的两次“危机” / 73
- 宿久高 与中国高校日语教育一起走过的 40 年 / 85
- 褚孝泉 我们走过的路 / 97
- 罗选民 春风化雨 / 107
- 陈国华 我的翻译路,我的翻译观 / 121
- 陆建德 高考杂忆 / 141
- 柴明颖 筚路蓝缕,砥砺前行
——记上外高翻学院的发展历程 / 149
- 于日平 国家兴盛,匹夫有幸
——发展是硬道理 / 161
- 周 烈 40 年回眸
——我与阿拉伯语 / 169
- 梅德明 东风日暖闻笙箫,桃李园地谱新章
——新时代英语课改亲历者之凝眸 / 179
- 许 钧 我的翻译与研究之路 / 193

- 庄智象 外语出版生涯的若干片断 / 209
- 卫茂平 在中国的高考和在德国的论文
——一个78级考生“最难忘”的回忆 / 233
- 王守仁 以服务为宗旨 以改革为主线
——我与大学英语教学 / 239
- 李宇明 我的外语情缘 / 249
- 殷企平 我心目中的外语学科40年 / 261
- 曹德明 改革开放与我的留学经历 / 275
- 王 宁 往事并不如烟,未来更加美好 / 285
- 程爱民 关于我国外语教育发展的几点思考 / 297
- 陈建平 应用语言学与我国外语教育 / 305
- 张绍杰 学习外语的路径有优劣之分吗? / 317
- 朱 刚 从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的发展看改革开放40年 / 325
- 黄国文 请进来与走出去
——关于学术国际化问题的思考 / 339
- 邹 申 TEM 考试阅卷历程回眸 / 353
- 章宜华 求学求知俗人轶事 / 361
- 杨信彰 与时代同行,在改革开放中成长 / 377
- 李绍山 与改革开放同行
——我的求学之路 / 385
- 李霄翔 漫谈大学教学生涯 / 395
- 王健宜 写给那些虽已远去但记忆犹新的岁月 / 417
- 王恩铭 从“英美概况”走向“英语国家概况”和“英美文化”
——40年英语教育改革之感想 / 429



谭载喜

谭载喜,1953年4月生,香港浸会大学荣休教授(Professor Emeritus),现为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席教授(兼)、博士生导师。原籍湖南省涟源市。本科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博士毕业于英国埃克塞特大学。2000年加入香港浸会大学,2003年获荐入香港“输入内地优秀人才计划”。加入香港浸大之前为深圳大学教授,曾执教于香港城市大学、湖南师大。历任香港浸会大学翻译学教授、翻译学课程主任、翻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浸会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深圳大学外语系教授、外语系主任、深圳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外事处处长、台港澳办公室主任;湖南师大外语系副教授、副主任。曾兼任北京语言大学、中山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暨南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湖南工大兼职教授;温州商学院客座教授;意大利奈达翻译研究院2009年度讲席教授。1996年入选广东“千百十”跨世纪人才工程,并被选为深大英语及翻译学科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多次应邀赴英国、意大利及中国港澳台地区,为高校、学会、政府部门做学术讲座和讲学。主持或参与多个国家级、省部级与校级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研资局资助的研究项目;组织或应邀出席国际国内各类学术会议,并做大会发言、主旨发言、学术报告;担任多个重要项目的通讯评审专家(包括教育部“长江学者”和人力资源部“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的专家通讯评委);澳大利亚纽卡素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新跃大学、中国内地及港澳地区多所大学翻译学系的校外顾问

及评审专家、博士论文校内外评审及答辩组专家或组长；国际国内多套丛书和学术期刊的编委或论文匿名评审，以及多个其他重要的学术兼职和匿名评审等。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哲学与理论、西方翻译史论、翻译的文化政治学研究、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英语言文化比较。共出版著、译作近20部，发表论文200余篇。主要专著有《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求索与发展》、《翻译与翻译研究概论——认知·视角·课题》、《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中国教育部推荐高校研究生教材）、《翻译学》；主要理论编译著作有《奈达论翻译》（香港商务印书馆门市部1985年冬季10大畅销书第一名）、《新编奈达论翻译》、《翻译研究词典》（主译）；主要文学译著包括《幸运的吉姆》（南京译林出版社20世纪经典丛书）、《汤姆·索亚出国旅行记》；论文主要刊发于 *Meta*、*Neohelicon*、*The Translator*、*Perspectives*、*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Babel*、*Asia Pacific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中国翻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外语与外语教学》、《东方翻译》、《翻译学刊》等国内外主要外语与翻译研究期刊。

中国翻译研究 40 年： 亲历者眼中的译学开放、传承与发展

1977 年 10 月 4 日,是我人生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是在参加天安门广场国庆晚会三天之后,我们一行来自全国九所高校与来自外交部等多个部属单位的 24 位年轻学子,晚上 10 点登上罗马尼亚航班,由北京起飞途经卡拉奇,到布加勒斯特转机后飞往目的地伦敦,开始了在当年无不令人向往的留学生涯。正是由于这个弥足珍贵的英伦留学之旅,让我有机会从一开始,即跟随祖国改革开放的跳动脉搏,见证及亲历着 40 年来我国翻译研究领域的开放、传承与演进。为此,我感到十分荣幸和自豪。

一、国门外的学术采撷与回归^①

英伦留学三年,我第一年在伊林高等教育学院(现名西伦敦大学)读英国语言文学,第二年中伦敦理工大学(现名西敏寺大学)读英语语言学,第三年在埃克塞特大学专攻当时归为应用语言学分支的翻译研究。本人因自小受一位在外交部从事翻译工作的近邻的影响,十分向往翻译工作,故而由高中毕业直接选送湖南师大英语专业就读开始,就一直把主要兴奋点落在了翻译和翻译功课的学习上。虽然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未能如愿成为专职翻译工作者,却也因为这个

^① 本节部分内容曾已见诸笔者所发《当代译苑的恒久之光——追忆一代宗师奈达》一文(载《东方翻译》,2011 年第 6 期,第 4—14 页)。随后三节部分内容则分别来自笔者所发表的《中国翻译研究:回望·反思·前瞻》(载《中国翻译》,2012 年第 4 期,第 7—9 页)和《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发展回望与本质坚持》(载《中国翻译》,2017 年第 1 期,第 5—10 页)。特此说明。

难得的留学机会,让心中的翻译梦开始以一种不同于原初的方式,慢慢地融入了祖国改革开放之后的译学发展大潮之中。

记得那是1979年雪融春暖的三月,中伦敦理工大学现代语言学院的一场翻译讲座,由时任该院院长的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教授主持,主讲嘉宾为美国圣经公会翻译部主管、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当时留学该校修读语言学的我,无疑就成了听课学生之一。虽然在国内大学所修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其中英语精读课程包括了翻译实践的内容,另外学校间或也会提供一两个翻译讲座,但实践也好,讲座也罢,当时在国内这类涉及翻译的课程,都基本属于翻译实践课的范畴,学的是某个句子、某些字词是用直译还是用意译,此外可能还会提一提严复的“信达雅”,但谈论最多的,似乎总是离不开直译、意译的问题。因此,那一次在中伦敦理工大学进行的翻译讲座,不仅是我第一次聆听奈达先生的讲座,同时也是第一次聆听到的、不同于此前在国内所能听到的翻译讲座。当时,我作为中国留学生,从刚刚开始对外开放的土地而来,对国外学术发展动态,对早已名震海外的奈达本人及其译学思想,自是全然不知或知之甚少。因而,奈达在台前所讲的一切,基本上都是我以前不曾听闻、不曾接触过的,属于全新的知识范围,因而极富吸引力,再加上讲者释放出的那种谈笑风生、睿智幽默,使我倍感亢奋。正是那次非同一般的讲座,将我带入当代翻译和译学研究的海洋,使我进一步明确要在翻译和翻译研究的道路上向前走的决心,脑海里也同时开始形成一个念想,要在学成回国之后,将在国门之外采撷到的异域译学成果带回祖国,介绍给当时信息渠道并不十分畅通的国内同行,译介、引进外来翻译思想,推动我们自己翻译研究的现代化,进而促进中外译学交流。

带着这个念想,本人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获得国外硕士学位回国的人员之一,于1980年底归国。归国后,一直致力于译介与研究国外的翻译理论、翻译思想,1981—1991年间发表翻译和翻译研究作品20余种,其中包括1984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后获香港商务印书馆门市部1985年冬季10大畅销书“榜首”称号的《奈达论翻译》;1991年出版的《西方翻译简史》和《翻译学》,这两本书于2004年获教育部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出版增订版,到2016年止增订版已七次重印。此外还出版了《翻译与翻译研究概论——认知·视角·课题》(2012)、《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求索与发展》(2017)以及1983年由湖南人民

出版社初版、后由译林出版社多次再版的“BBC 英国最伟大的 100 部小说”之一的《幸运的吉姆》译著，等等。

值得特别追忆的往事之一，是本人对奈达“翻译科学”、“动态对等/功能对等”和“读者反应”等三个概念的认知与译介。这三个概念，是构成奈达翻译思想的核心概念；是自本人对他的翻译理论和思想译介到中国以后，影响最大、引起争议最多的外来翻译思想之一；同时也是本人自 1979 年第一次参加奈达讲座起，至 2004 年与这位西方翻译理论大师最后一次相见、相叙于罗马国际会议止，我向他不十次面对面请益和与之交谈最多的翻译理论话题，其中包括 1983 年他到访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名北京外国语大学）期间、邀约本人赴北外听他第二次来华讲座期间与他的讨论；1985 年他与夫人^①到访南京大学和南京金陵神学院期间、邀约本人在其演讲之余与他的交谈；以及他先后三次到访本人所在学校及寒舍与本人较长时间的交谈与交流。

当然，在相隔三四十年之后的今天，在英文以外的华文地区，奈达的翻译思想和他思想中的这些概念，都早已为人耳熟能详，本文无意、也不适宜在此针对这些概念引发的各种争议展开讨论。但我想在此指出，特别就奈达所提“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translating”（翻译科学）之说而言，不论是否认同它的意涵，或是否同意将“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translating”这一英文表述译为“翻译科学”，我们都不能不回归到奈达本人所表述的基本立场上，即，翻译具有多面性，它既为艺术、技术，也是科学。因此有时他在与本人的直接对话中，还语带玩笑且不无欣赏地说：不少人甚至把他称作“father of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翻译科学之父）。需要再三指出的是，当我们肯定或赞扬奈达的理论时，我们需要意识到它可能存在的局限和不足，不要盲从；而当我们批评它的局限或不足时，却也无须妄加指责，把那些本来合理的部分也否定掉。尤其是，有些人在后“言必称奈达”时期，常常对奈达的一些核心理论横加批评，甚至彻底否定，如对上面提到的他的“动态对等/功能对等论”和“读者反应”，可是又不拿出或拿不出可以取而代之的更好的理论和思想。这是我们在接受或者不接受外来翻译思想抑或本国传统翻译思想时，所必须认真思索的。

^① 这里是指奈达与他的第一任夫人奥尔西娅（Althea）。奥尔西娅于 1992 年去世，奈达于 1997 年再婚，第二任太太艾琳娜（Elena）是西班牙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担任欧盟委员会翻译部门负责人。

二、改革开放成就了翻译学在中国的发展

从上面叙述到的本人自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以来的个人学术轨迹不难看出,没有祖国的改革开放,就不会有我的英伦留学和随后的回国贡献。从宏大层面看,没有改革开放,也就不会有今日中国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其中无疑也包括了中国的翻译研究领域的辉煌成就。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祖国的全方位改革开放,才成就了20世纪80年代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在中国的发生,以及在今天的持续演进和发展。

回顾这40年,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广,成果之丰,都是以往任何时期不能比拟的。当代中国翻译研究作为独立学科自主发展的这个重要阶段,其起始时间可以说有三个互相联系的标志:一是从纯粹的时间层面看,它始于1980年。这一年,作为《中国翻译》杂志前身的《翻译通讯》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编辑、出版和发行。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经有过1950年创刊、1952年休刊、1953年复刊、1954年最终停刊的《翻译通报》,1980年面世的《翻译通讯》或许仅能视作《翻译通报》在“休眠”半个多世纪后的延续,但毕竟名称与编辑方针、出版政策及主管属性乃至期刊内容都发生了变化,因此应当说这是一个崭新的开端。当下持久闪亮的中国翻译研究之光,正是由1980年发行的这份《翻译通讯》才真正开始点燃的。二是从专业发展的层面看,当代中国译学较大发展的起始年是1983年,因为这一年,《翻译通讯》移交给中国译协作为该会会刊,并于1986年改名为现在的《中国翻译》,这标志着在组织结构上中国的翻译和翻译理论工作者自此有了自己研讨翻译问题的专业和理论园地。三是从理论研究的层面看,中国翻译学的较大发展,是以1987年首届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召开为起始标志的。记得当年会议主要由《中国翻译》编辑部的罗进德、高峰等人筹备,7月在青岛举行,本人有幸应邀与刘宓庆先生及其他几位学界前辈与同仁,分别在会议第一天作大会发言,本人围绕“关于建立翻译学”的主题,阐述把翻译学作为独立科学学科发展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问题,相关发言内容先后在《中国翻译》(1987年第3期)与《外国语》(1988年第3期)刊出。刘宓庆先生的发言内容,则主要涉及翻译研究的中国特色以及如何展开翻译研究的问题。与此同时,本人还在《外语教学与研究》(1987)、《湖南师大学报》(1987)等刊连续发文,就翻译学的性质、